

我们应当在这样一个宏大的格局下讨论上海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来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之就要树立起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意识和观点。我们东亚地区将成为一个区域经济，构成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大区域经济中还可以以不同层次分为多个区域，需要几个经济中心，其中一个区域就是长江流域，经济中心应该落在上海，上海的发展宜更上一层楼，应该瞄准这个大格局和大目标去做事情，不要分心。简言之，上海应该在更高层次上，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观点出发，考虑成为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

总的来说，应该把贸易、金融、科技、信息抓上去，而把层次比较低的工业分出去，一层层地分出去，同时，要充分利用贸易、金融中心的力量，把腹地一层层地带动起来，这才是区域经济中的大上海，这样的上海，就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的龙头。换句话说，要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10多年前，正是以这个思路为底子，我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这个大的格局，是我从早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用心思考，带着问题到出走，到处看，到处问，一步步看出来的。

我对上海的这种期望，使我常常考虑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现代化意义的中心都市，必须同时拥有其“腹地”。这方面的理论我在考察沿海城市的时候讲了多次，最近几年中央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会更显出建设“中心”和“腹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来说，一方面，有“中心”才能发展腹地，另一方面，有腹地，“中心”才能站稳，才能不断提升，中心与腹地二者是互相紧扣的环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正是如何发展上海这个中心，并由这个中心带动它背后广阔的腹地，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而带动中国经济更好的进入世界经济。这样我们可以从上海的发展中看到中国整个的发展，我们需要有不同层次的小、中、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层层连同中心，全面又有重点的塔型发展。上海的定位和它的发展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理想的蓝图。

正是这种思路下，近20年前民盟中央曾经提出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方案：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两省为两翼，苏、锡、常、通、杭、嘉、湖、绍、甬等中等城市为卫星城市，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长江的水道，并加快发展公路和铁路运输，有如京九铁路穿糖葫芦式的形式，在交通沿线发展一批中等城市。当时这些设想还仅仅是一种远景式的蓝图，但经过这么多年你发展的努力，已经使得这种蓝图逐步变成实际操作的计划和规划了。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一方面把多年来追踪研究的想法归纳一下提供讨论，也希望在大家的讨论中吸收意见，把这个蓝图更加具体化，提供政府参考发生实际作用。

二、

谈到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就不能离开全球化这个背景。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全球一体化的问题。可是在现实中，要在全球一体化中获得有利的位置，每个国家首先要实现本国国内的一体化，至少是主要区域的一体化，也就是要建立起若干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大市场，要建立起这样规模的大市场，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大城市作为中心。有的同志讲我国有三个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就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现在看来，这三个地区要形成区域经济实力，都需要发展各个层次的中心城市，拿长江三角洲来说，它必然要以上海为中心，周围还要有许多



低一级的中心城市，有了这些城市，整个区域的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上海的优势，有地理的因素，但主要是特定的历史造成的。在近现代史上，上海很早就成为全国的一个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20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已经有168家银行，当时世界上58家比较大的外国银行在上海设了分行，上海已经是亚洲金融的中心。我本人是苏南人，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我很小的时候就来过上海，那时我住在吴江县松陵镇，听大人说要到上海来，就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在镇上我们算是“城里人”，但到了“十里洋行”的上海，就成了“乡下人”，就是北方话说的“土包子”。当时上海的各种商品的进出口量，占全中国的50%-60%，是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也是东亚最重要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交汇中心和集散地之一，这就是有些海外学者所说的，在国际化的话语中，“上海”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它更是一个“概念”，一种“记忆”，一个“品牌”，这是其他城市——比如台北或香港——所没有的。

但是自从抗日战争以后一直到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上海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城市了。一方面香港迅速崛起，取代了上海的地位。一方面大陆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由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城市，解放后，国家投下大量资金，把上海建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工业发展很快，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下每年曾经向国家上缴高达200亿的利润。建国以来，包括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解放后，我国面临着极特殊的情况，先是被西方国家封锁，后来自己又关上了大门，上海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外贸的地位长期没有恢复。同时，产品经济下，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基地的沉重的生产负担，使得上海没有力量重新改造自己的城市，自身的城市基础设施无法跟上去，曾经欠了很多帐，人们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几十年下来，到80年代，上海确实变得陈旧了，但是，上海内在的优势，特别是优良的人口素质、蕴藏在市民生活中的深层次的现代性、都市性，并没有基本改变。后来小平同志提出要再造几个香港，又提出要恢复上海的地位，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上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同时也意识到了上海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从90年代以来的发展实践来看，只要条件恢复，上海的活力会立即迸发出来。事实表明，要在大陆上再建一个香港、东京、巴黎或纽约式的大都市，实在非上海莫属。现在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上海已经恢复了常青常新的面貌。

上海最直接的腹地就是长江三角洲，这里从前工业时代直到近现代，一直是农业、加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鱼米之乡，是盛产粮食、经济作物和畜产品的宝地，而且通过便利的水陆交通，又联得上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广大腹地，就这方面来看，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有条件通过内河航运和铁路公路运输为全国性的对外贸易中心。说到这里，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的内涵已经逐步明确起来。我还想强调一点，为了充分发挥这个区域的功能，区域内将会存在“分”与“统”的双层结构：基层是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独资、合资、合作等所有制，是多元化结构，而上层可以是上海与江浙合作，并和国家配合形成高层次的贸易、金融、运输、科技服务中心体系。只有强化这个区域层次和国家层次的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全结构的统一协调。不难看出，这种双层结构既体现了本区域市场经济中多种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体并存竞争的总格局，又保证了本地社会在总体上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化的同步和协调。

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有必要从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这一区域的发展。

我在过去20年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关注小城镇的发展建设问题，



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我们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必须自下而上的发展起多层次的犹如宝塔形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程度地减低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的平稳进行。我当时提出新型的小城镇可能成为防止人口超前过度集中的蓄水池的设想，就是这个意思。鉴于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释放出长期关闭在传统农村里的大量人口，如果这股激流没有缓冲和蓄积的中间体，势必发生显而易见的社会恶果，也正是因此，大约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我们国家采取“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 and 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基本国策，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符合实际的最佳选择，避免了不加限制地放任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所可能引起的社会灾难。正是在这种有控制的速度和节奏下，我们在农村建立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发展中等城市，又在发展中等城市的条件下有步骤地发展上海式的特大城市，这样层层缓解压力，避免全面的冲击和混乱，在这种“护航”下，特大城市才能健康地发展为国际水平的经济、贸易、金融、科技中心。

现在，我们经过了这 2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也有了很大的调整，人口综合素质获得了很大提高，目前已经有条件提出建立国际化中心都市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成功进入 WTO 之后，更有必要和可能这样做。近几年，上海的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跨入一个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浦东新区已经建成现代都市社会，上海原来的市区也正在经历全面现代化改造，新的意义上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特大的经济中心，其城市形态、经济实力、都市性、内在活力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新的高度的视角，考虑上海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层次城市发展的意义。

所以我经常说近几年我本人也“从农村进了城”，指的是这几年我越来越多地把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作为我研究的一个重点，并且在研究中加深了对各类城市的认识。在 21 世纪中，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像上海这样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成为中国和东亚经济社会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具有国际辐射力。历史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入中国，强迫我们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就是当时外国势力最集中的地带，被动地被纳入国际经济体系。今天，我们中国人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在全新的意义上，自主地书写我们的历史，把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建设成一个真正“中国的”国际大都会，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经济发展本身。

三、

目前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强烈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但越是在这种氛围中，我们越要提醒自己，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保持我们思考的自主性和现实性，一切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

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城乡关系格局究竟怎样最好，移民问题究竟如何处理才有利？城市发展规模多大最好？等等，这些问题，都不能简单地从别国经验或教科书中获得答案，我们必须到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社会实际中去进行深入的、持续的、多角度的调查研究，弄清“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别人的经验，提出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创新。

举个实例，这几年大家看到巨大的民工潮，几千万民工从内地涌向沿海比较繁荣的城市，这



也是世界范围内创纪录的人口流动，很多人都担心会出问题，但是至今没有引起大的混乱，也没有出现某些国家出现的贫民窟、无家可归者、大规模犯罪等趋势，我国的情况，是这种市场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例外，为什么呢？我们不妨从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家庭制度和文化传统中去找原因。我曾推敲这个原因，我看到了一个稳定的因素，那就是在新兴城市打工的民众，每人几乎都有一个家在内地，他们得到工资后，除了生活必需的开销之外，通常都定期寄回家去，过年过节有可能的就回家去呆上几天。如果城里找不到工作，如果停工了，他们有家可回。有工作，心里踏实，工停了也不用着慌。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发现了我过去一些农村研究中忽视的东西：过去我就没有理会到农村里的承包责任制在新兴的城市里也会有这样强大的安定民工的力量；换一句话说，我没有估计到农村现行的制度实际上对建设现代都市具有一种重要的支持作用。

像这一类知识和问题，西方人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他们的著作中也很少有这样的分析，但它对我们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把以农户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中国传统的乡土文化及家族制度综合起来考虑，就可以从一种文化的内部，发现千百万移民“有家可归”的社会基础，发现西方人士所不易理解的社会保险的巨大力量。这是从中国实际情况里总结出来的社会学知识。这一类社会学知识使我们能够发现我们自身的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发现如何发掘自身社会内在的潜能，比较顺利地承受和渡过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和压力。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使得我们注定要成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过程的探索者，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这种探索和奋斗中，深切理解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是十分重要的。

又比如，我们说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以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力量，但这个力量的基础究竟在哪儿？是国际经济的刺激？是国家政策的推动？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相信我说过的一句老话：力量在老百姓中间。要靠存在于民间的、普遍的、真实的实力。区域发展的真正持久地、广泛的动力，永远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因此，我觉得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想一个办法，把长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的各种基层力量释放出来，联合起来，变成促进区域发展的持久动力。按照这种寻求动力的路径，上海周围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就不是被动等待“开发”的地域，而是蕴藏着巨大活力的源泉了，像苏、锡、常、通、杭、嘉、湖、甬八员大将，都蕴藏着很强的实力，这种实力，包括资金、技术等，也包括人们的文化、习俗、组织、心理、热情、信心、信任等等力量，它们本身就有推动上海向上提升的作用，上海应该积极主动地联合这八大将的人力物力和社会文化力，这股力量是了不起的；同样，在比这些中等城市更小一级的诸多小城市和小城镇中，也蕴藏着向上推动的社会力量，所以这一点我要重新提一提，上海除了致力于吸引“有形的”外国资金之外，也要以积极的态度，开展对内的联系，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吸引内地“软”的和“硬”的“无形的”实力。

就人力来说，上海要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需要大批专业人士，除了自己培养以外，还要靠全国各地的支持，怎样能做到既吸引了外地人才，又不会引起地区间的矛盾？这必须要有一套好的办法。上海名声越来越响，慕名而来的人会越来越多，大陆内的、港澳台的、世界各国的人，都会涌进来，不仅人数多，而且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会突然汇集到一起，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你们这个城市究竟能容纳多少人口？周围的居民点有多少人口住在一起，他们做什么事？在哪里做事？这些人需要多少供给？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保险、福利、老年问题等。这都需要我们加以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上海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社区，不同文化的冲



突、交往、交流、宽容的问题，都会被提出来，怎么解决？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通过实际调查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我在上海提倡“社区建设和研究”就是为了追求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

腹地中各类城市、乡村和中心城镇的互动关系，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区域的一般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内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生活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的问题。在与上海这个中心大都市的互动中，当前长江三角洲大量的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村庄的演变方向，就会对三角洲未来的基层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比如，过去上海曾经比较封闭，加上体制方面的原因，对外的辐射力不够，后来情况变了，从浦东开发开始，全上海开放了，上海人的心理上也开放了，邻近的昆山接受上海的辐射，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没有几年就成了中等经济发达地区；江阴大桥通了车，苏北就能比较顺畅地接受苏南地区的经济辐射，很快也会发展起来，这座大桥的建成，使这个区域的经济变化加快，以至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江苏的经济发展必然对整个长江三角洲范围的发展产生影响，又反过来推动上海的发展。这种复杂的关系，值得我们学者和政界人士考虑。每一个城市、乡村的负责人，都不妨看看我们自己在整个格局中是占什么位置，各个地区要发展什么产业，发挥什么功能，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在我看来，现在上海发展所缺少的，还是作为中心都市的上海和作为腹地的长江三角洲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纽带，缺少一批围绕它的、能把它托起来的中等城市。目前的这些中等城市，虽然存在，但是在各方面没有形成完美的配合和互动，很多东西没有理顺，影响了综合、系统能量的释放，如果上海周围有了一个职能搭配完好的中等城市群，它们就可以一方面推动上海向上提升，同时又把上海的经济能量扩散到周围腹地，促进整个区域基层社会的优化和发展。

四、

总之，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经济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中国几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最繁华地带所面临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国现代化的奋斗，并不是在一片平整的空地上随意建造新的楼房，而是在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参差不齐的区位格局里选择、培育出适于未来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生命园地，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化、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化将在这里发生强烈的碰撞、交流、吸收和融合，这是一个世界文化融合的大问题，我想这也是下个世纪世界上将要碰到的大问题，我以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只有对这项巨大社会变革工程的根本性质有深入的理解和领悟，我们才有可能最经济、最有效地设计出这个巨大工程的蓝图。

【译文选载】

